

《三国演义》描写赤壁之战战场方位的历史真实性

王前程

(三峡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摘要:《三国演义》描写三国赤壁之战发生于江夏郡邾县、鄂县之间大江之上,即今湖北黄州、鄂州境内;又将“赤壁”“乌林”等地明确在长江北岸黄州市沿江一带。作者罗贯中熟读史籍,认真研究过三国时期的诸多重要战役,《三国演义》对于赤壁之战战场方位的界定,完全是基于魏晋原始史籍的记录,具有毋庸置疑的历史真实性。

关键词:《三国演义》;赤壁之战;赤壁;三国

中图分类号: I207.4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4476(2017)09-0005-07

陈寿《三国志》在许多人物的传记中记述了东汉末年发生的一场决定三足鼎立的关键战役赤壁之战,但并未明确记述战役发生的具体郡县,于是关于赤壁之战的方位问题历来争论不休,至今存在着“蒲圻”“嘉鱼”“武昌”“汉川”“黄州”“钟祥”等多种异说。明初历史小说名著《三国志通俗演义》(下简称《三国演义》)描写赤壁之战发生于今湖北黄州、鄂州一带,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文学虚构之笔,并非历史上赤壁之战发生之地,真正的古战场在湖北蒲圻一带。然而,文学的描写未必不是历史的真实再现,人们普遍认可的历史却未必就是真相。罗贯中对于赤壁之战战场方位的描述与魏晋原始文献记录高度吻合,具有深刻的历史真实性。

一、将赤壁之战方位界定于江夏郡东部切合汉末军事态势

《三国演义》之《刘玄德败走夏口》一回描写曹操亲率大军征伐刘备和孙权“马步水军八十三万,诈呼一百万,水陆并进。船骑双行,沿江而来,西连荆、陕,东接蕲、黄,连络寨栅三百余里,烟火不绝。”^{[1] 418}《诸葛亮舌战群儒》一回描写曹操写信给孙权说“欲与将军会猎于江夏。”^{[1] 420}又写虞翻说“今曹公兵屯百万,将列千员,龙骧虎视,平吞江夏。”^{[1] 423}

足见小说明确将赤壁之战发生地确定在汉末江夏郡境内,又指明大致范围在江夏郡之东部。文中所谓“荆、陕”,指荆州、峡州,即今湖北荆州市和湖北宜昌市。“陕”乃“峡”字之误,本为两汉夷陵县,北周以后改曰“峡州”,清代升为“宜昌府”。所谓“蕲、黄”指蕲州、黄州,即今湖北蕲春县和湖北黄州市。

《三国演义》古今地名混用,所言“荆州”“峡州”实为东汉荆州南郡之江陵县、夷陵县一带,“蕲州”“黄州”实为东汉荆州江夏郡之蕲春县、邾县一带。汉之邾县辖今湖北武汉市新洲区东部和黄州市黄冈、麻城、罗田等县市,隋以后改称“黄州”,延续至今;蕲春县辖今黄州市浠水、蕲春、黄梅、广济等县市。罗贯中说曹操大军“西连荆、陕,东接蕲、黄,连络寨栅三百余里”显然不合情理,从南郡夷陵县至江夏郡邾县、蕲春县一带至少有一千余里,绝非相距三百余里。但小说描写曹操大军已经越过夏口(今武汉市市区)而至江夏郡东部之邾县(黄州)一带,即确定赤壁之战发生在江夏郡东部,则完全符合汉末建安十三年的军事态势。

(一)赤壁之战前曹操集团已经控制了江夏郡江北大部分地区

众所周知,陈寿《三国志》之《武帝纪》《先主传》《荀彧传》《文聘传》和虞溥《江表传》等史籍对于曹操征伐荆州、刘备仓皇南逃的过程作了较为完整而清楚的记述:

太祖将伐刘表,问彧策安出,彧曰“今华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会表病死,太祖直趋宛、叶如彧计。^{[2] 238}

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

收稿日期:2017-05-05;修订日期:2017-07-06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重点项目(15D011);三峡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开放基金重点项目(2017KF01)

作者简介:王前程(1963—),男,湖北浠水人,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明清小说,三国历史文化。

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韩嵩、邓义等。^[21-22]

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憙救合肥。权闻憙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21-22]

太祖先定荆州,江夏与吴接,民心不安,乃以聘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边事,赐爵关内侯。^[403]

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会,得济沔,遇表长子琦万余人,与俱到夏口。^[654]

裴松之注《先主传》引虞溥《江表传》曰:

备从鲁肃计,进驻鄂县之樊口。诸葛亮诣吴未还,备闻曹公军下,恐惧,日遣逻吏于水次候望权军。吏望见瑜船,驰往白备,备曰“何以知非青、徐军邪?”吏对曰“以船知之。”^[655]

由此可知几点信息:其一,荀彧主张采取出其不意之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荆州,曹操完全采纳了其建议。其二,建安十三年(208年)七月,曹操兵发许昌(今河南许昌市),开始南征。八月,曹军前锋攻占荆州南阳郡叶县、宛县、新野县(今河南叶县、南阳市、新野县)一线,威逼襄樊(今湖北襄阳市)。九月,曹操中军至新野县,迫使襄阳刘琮投降,樊城刘备南逃;曹操精兵急行军追剿刘备,在当阳长坂(今湖北当阳市东、荆门市南)重创刘备集团,刘备仓皇逃至夏口一带(今武汉市),曹操进占南郡郡治江陵(今湖北荆州市)。其三,曹操占领江陵后,一边处理安抚百姓、论功行赏等政务,一边加紧军事部署,特地任命荆州降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其率领本部人马(“统本兵”)和部分北方军队(“典北兵”)前往江夏郡,控制关口要隘,为曹军主力征剿刘备和孙权打前站。其四,刘备残部及刘表江夏太守刘琦所部在曹操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已成惊弓之鸟,全部撤至江南鄂县(今湖北鄂州市)一带,江夏郡江北大部分地区应在文聘控制之下。其四,十二月,曹操大军集结于赤壁,遭遇联军抵抗而失败,加上军中流行传染病,严重影响了士气和战斗力,而被迫退保南郡。

总之,建安十三年十二月之前即赤壁大战前,曹操军队已经越过夏口(今武汉市)到达江夏郡东部江北邾县(黄州)一带。《三国演义》将赤壁之战战地方位确定在江夏郡东部邾县(黄州)境内,其依据正是汉末曹操大军东进的态势。

(二) 赤壁之战前刘备集团已经撤至江夏郡东部长江南岸

据《三国志·武帝纪》等文献记载,建安十三年九月,刘备集团撤至夏口。那么,刘备所至的“夏口”何所在呢?作为自然地理名称,“夏口”又称“汉口”,是夏水(汉水与夏水合流后亦称夏水)注入长江处,应位于长江北岸。但刘备集团所至“夏口”,则是指“夏口城”。许多学者以为刘备屯驻的“夏口城”在长江北岸,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最迟在汉末建安初期,今武汉市长江南岸就建有军事城堡,名“夏口”。《三国志·荀彧传》之“裴注”引无名氏《平原祢衡传》曰“衡南见刘表,表甚礼之。将军黄祖屯夏口,祖子射与衡善,随到夏口。”^[234]《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之“裴注”引《江表传》曰“策收得勋兵二千余人,船千艘,遂前进夏口攻黄祖。”“策与战,大破之。”^[820]又引张勃《吴录》载孙策上表汉献帝曰“臣讨黄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羡县。”“火放上风,兵激烟下,弓弩并发,流矢雨集,日加辰时,祖乃溃烂。”^[820]黄祖是荆州牧刘表任命的江夏太守,祢衡随黄祖之子黄射到夏口是在建安三年(198年),同年被黄祖杀害,被埋在夏口城外,因生前作过《鹦鹉赋》,后人将其葬地称作“鹦鹉洲”。孙策大败黄祖之战发生在建安四年(199年),黄祖所屯驻的“夏口”在江夏郡沙羡县境内,而沙羡县所辖区域均在长江之南。六朝地理著作也有夏口城、鹦鹉洲等地名位于长江南岸的记载。《晋书》卷十五《地理志》载曰“沙羡:有夏口,对沔口,有津。”^[294]《水经注》卷三十五《江水》曰“江之右岸当鹦鹉洲南。”“江之右岸有船官浦,历黄鹄矶西而南矣。直鹦鹉洲之下尾,”“船官浦东即黄鹄山,”“黄鹄山东北对夏口城,魏黄初二年孙权所筑也。”^[804-805]

《水经注》说孙权于魏黄初二年(221年)建造“夏口城”,是不准确的。按《三国志·吴主传》载,孙权建城时间是吴黄武二年(223年)。孙权重建的夏口城与建安初期黄祖所屯夏口城是不是同一地点,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东汉三国时期的夏口城建在长江南岸黄鹄山下,与北岸的沔口隔江对望。黄鹄山,又名黄

鹤山,即今武汉江南蛇山,位于今武汉市江南武昌区。刘备在大兵压境、军情危急的情况下,无疑会将兵力撤到长江南岸,依托长江天险布防,如若驻守长江北岸,岂能抵挡曹操大军的进攻?《三国志》之《张飞传》说“曹公入荆州,先主奔江南”^[700],《伊籍传》说伊籍“随先主南渡江”^[721],《刘巴传》说“曹公征荆州,先主奔江南”^[728],均可佐证刘备当阳之败后直接撤至江南驻扎。另外,周瑜向孙权建议由他率精兵三万“进驻夏口”,也是基于夏口城一带能够依托长江天险布防,如果进驻的“夏口”在江北岸则如何立足,精通谋略的周瑜岂不是缺乏军事常识?

而撤至江南夏口一带的刘备集团兵力显得严重不足,且士气低落,无法独立承受曹操大军的压力,因此,寻求孙权集团的援救势在必行。正在观望踌躇之际遇到前来打探消息的鲁肃,鲁肃力主两家联合抗曹,并建议刘备将主力撤至鄂县(今湖北鄂州市)一带布防。“裴注”注《先主传》引《江表传》云“备大喜,进驻鄂县,即遣诸葛亮随肃诣孙权,结同盟誓。”^[655]又云“备从鲁肃计,进驻鄂县之樊口。”^[655]《三国演义》之《周瑜三江战曹操》一节叙述“玄德尽把江夏之兵屯于樊口驻扎”^[440],与《江表传》所记一致。北宋大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六十五中亦完全认同并抄录了《江表传》的记录。可见,赤壁大战之前刘备集团退守的地点是江夏郡东南部的鄂县樊口一带。

(三) 赤壁之战前孙权集团已控制江夏郡东南诸县

东汉江夏郡所辖范围较广,北至大别山北麓,西至汉水一带,南至幕府山,东至大别山,涵盖今湖北武汉市全部、咸宁市大部、黄州市大部、孝感市大部和随州、天门等地市部分县镇以及河南信阳市大部。刘表坐镇荆州时期,江夏郡就被曹魏集团和东吴集团不断蚕食。《三国志·张辽传》载:建安十年(205年),曹操命大将张辽“别击荆州,定江夏诸县。”^[389]此“江夏诸县”无疑是位于大别山北麓的平春侯国、鄢县、软侯国、西阳县等县(相当于今河南信阳市中部与西南部地区),刘表对此鞭长莫及。

而东吴孙氏集团对于江夏郡的威胁更大。建安四年孙策重创刘表江夏郡太守黄祖;孙策死后,孙权又多次发动西征江夏之战。《三国志·吴主传》载:“(建安)八年,权西伐黄祖,破其舟军,惟城未克,而山寇复动。还过豫章。”“十二年,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十三年春,权复征黄祖,祖先遣舟兵拒军,都尉吕蒙破其前锋,而凌统、董袭等尽锐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骑士冯则追枭其首,虏其男女数万口。”^[826]《周瑜传》《甘宁传》等传记亦记述了征江夏灭黄祖的军事行动,孙权集团所屠之城当是夏口城。但孙权几次进攻江夏郡都是以掳掠人口和物资为主要目的,仗一打完就撤回江东。这主要是因为战线过长,兵力不足,无法长期守住江夏郡腹地,更加上当时东吴境内不稳定,“山寇”叛乱频繁,需要集中精力巩固后方。

然而黄祖被剿灭之后,东吴集团开始着手控制江夏郡东南诸县。《三国志·胡综传》曰“胡综字伟则,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将避难江东。孙策领会稽太守,综年十四,为门下循行,留吴与孙权共读书。策薨,权为讨虏将军,以综为金曹从事,从讨黄祖,拜鄂长。”^[1042]胡综与孙权关系甚密,随孙权参加了征伐江夏之战,黄祖被剿灭之后,被拜为“鄂长”,即鄂县之长。一县之长官职固然不高,但鄂县西北紧邻沙羡县,通连军事要塞夏口城,东南接壤下雒县(今湖北黄石市阳新县及大冶县部分区域)和东吴水军基地柴桑(今江西九江市),境内又有众多滨江军事关隘,如樊口、樊山、西塞山等,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孙权任命文武全备的胡综为“鄂长”,其目的是为了将鄂县一带经营成为东吴集团日后西进的战略基地。虽然魏晋史籍没有记录赤壁之战前东吴集团对下雒县的管控,但下雒县紧邻鄂县,又是柴桑之西北门户,其战略地位亦十分重要。既然鄂县已经成为东吴集团的战略前沿,那么孙权不可能不占据处于柴桑和鄂县之间的下雒县等战略要地。

此外,位于大别山东南角、与下雒县、鄂县隔江相望的蕲春县亦被孙权集团所控制。杨守敬《水经注疏》卷三十二曰“蕲春,汉旧县,因蕲水以为名。”“守敬按:汉蕲春县属江夏郡,后汉因,吴置蕲春郡,旋入魏,后复入吴。”^[2657-2658]《辞海》释“蕲春”云“郡名。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分江夏郡置。治蕲春(今蕲春蕲州镇西北)。”^[1317]综合这两条材料可知:建安十三年春夏,孙权剿灭黄祖后分江夏郡东南部江北地区置蕲春郡;同年秋冬,曹操大军东进,蕲春归魏(至少名义上归属曹魏江夏郡太守文聘管辖);不久,赤壁之战曹操失利,蕲春复归东吴。

由此可见,赤壁之战前江夏郡东南部鄂县、下雒、蕲春等县已被孙权集团所控制。尽管黄祖被杀几个月后刘表任命刘琦为江夏太守,但荆州水军主力已被孙权集团歼灭,刘琦已无力讨还鄂县等失地。而刘琦上任伊始,曹操大军南下,刘表病逝,刘琮降敌,刘备逃至夏口,曹魏集团已成为威胁刘琦、刘备和孙权三方的最大敌人,故而鲁肃劝说刘备进驻东吴控制的鄂县以便与吴联合抗曹,实属情理之中。

综上所述,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描写曹操大军进击江夏郡东部蕲、黄之地(汉邾县,今黄州市),而孙刘联军与之隔江对峙,赤壁之战就此拉开序幕,即小说将赤壁大战之地确定在今鄂东地区,是完全符合东汉建安十三年曹、刘、孙三大军事集团所形成的军事态势,具有很强的历史纪实性。

二、将大战之地“赤壁”确定在江北岸符合原始史料记录

《三国演义》之《周瑜三江战曹操》一回描写周瑜、程普、鲁肃率东吴水军“驾起风帆,迤迤上水往夏口而进。离三江口五六十里,船依次第,摆布已定。周瑜在于中央下寨,岸上依西山结营,周围下寨五十余里。”“玄德尽把江夏之兵屯于樊口住扎,令人登高望之。回报曰‘南岸尽是东吴家战船;北岸隐隐烟火不绝,乃青州、徐州之兵。’”“时建安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平风浪静,北军大进。正使船到三江口,南船已摆开。”^{[1] 439-442}

《群英会瑜智蒋干》一回描写东吴水军前锋与曹操水军前锋初战三江口,东吴水军耀武扬威。“三路战船,纵横于三江水面,掩杀北军,”“北军都退,中箭着炮者不计其数。周瑜虽精于水战便利,惟恐寡不敌众,遂下令鸣金,收住船只。北军尽回沿江一带分二十四座水门,以大船居于外,以为城郭;小船居于内,可通往来。”^{[1] 444}

《曹孟德横槊赋诗》一回描写曹操在大船之上置酒设乐,大会文武将佐“指南屏山如画,东视柴桑之境,西观夏口之江,南望樊山,北觑乌林,四顾空阔,心中暗喜。”“饮至半夜,操酒酣,遥指南岸曰‘周瑜、鲁肃,不识天时!幸有归顺之人,为彼腹心之患,此天助吾也!’”^{[1] 466}

《七星坛诸葛亮祭风》一回写诸葛亮笑对周瑜曰“都督若要东南风时,可于南屏山筑一台,名曰‘七星坛’”“亮于上作用,借三日三夜东南大风,助都督用兵,如何?”^{[1] 472}

《周公瑾赤壁鏖兵》一回写赤壁大战前周瑜排兵布阵,令甘宁“打北军旗号,直取乌林地面”;令太史慈“直奔黄州地界,断曹操合淝接应之兵,就逼曹兵”;令吕蒙“往乌林接应甘宁,焚烧曹操寨栅”;令凌统“直截夷陵界首,只看乌林火起,以兵应之”^{[1] 476}。又写黄盖率精锐水兵诈称运粮降曹“望赤壁进发”,“上书‘先锋黄盖’名字。操笑曰‘公覆来降,此天助吾也。’来船渐近,程昱看之良久,复曹操曰‘来船必诈,且休教近寨。’”“聘立船头大叫‘丞相均旨,南船且休近寨,就江心抛住。’众军齐叫‘快下了篷!’言未绝,弓弦响,文聘被箭射穿左背,倒在船中。船上鼎沸,各自奔回。船到操寨,隔二里水面,黄盖用刀一招,前船一齐发火。火趁风威,风趁火势,船如箭发,烟火涨天。”^{[1] 479}

由上述描写可知,罗贯中明确地指出了赤壁之战战地的具体方位:

第一,大战双方在今鄂东地区隔江对峙,重要军事地名均在今鄂州、黄州境内。

作者称曹操大军为“北军”和“青州、徐州之兵”,称东吴水军为“南船”,又写曹操“遥指南岸”,则曹操大军在长江北岸,孙刘联军在长江南岸。东吴水军与曹操水军初战于三江口江面之上,以东吴水军获胜告终。三江口水战之后,双方隔江对峙。周瑜大本营设在江南鄂县(今鄂州)西山脚下,刘备大本营设在鄂县(今鄂州)樊口;曹操大本营设在江北邾县(今黄州)赤壁一带。

小说所述重要地名均在鄂县和邾县境内。西山位于今鄂州市城区内,秦汉时期称“樊山”,三国时期孙权建都鄂县,改曰“武昌”,因樊山位于武昌城之西,故俗称“西山”。《方輿胜览》卷二十八曰“樊山,在武昌西三里,一名西山。”^{[2] 786}西山与樊口相邻,在樊口之东约五六里处。刘备驻扎于樊口一带,便于同周瑜协调指挥作战。“三江口”指三江交会处,位于鄂县和邾县之间长江及其支流交会处,距今鄂州西山约五十里,距今黄州赤壁约三十五里。宋人范成大《吴船录》卷下曰“风稍息,解维小泊汉口。”“通行百八十里至三江口宿。三江之名,所在多有,凡水参会处皆称之。庚寅,发三江口,辰时过赤壁,泊黄州。”^{[3] 870}《吴船录》乃游记之作,是范成大乘船自川蜀顺江而下的沿途见闻录,所述地名均为实有地名。所谓“庚寅”指庚寅时,即凌晨五点左右“辰时”指早上七点前后。参照范成大的记述,《三国演义》所写“三江口”无疑是指鄂州、黄州一带的三江口,距离上游的汉口(夏口)约一百八十里;从三江口出发,船行约两个多小时至黄州赤壁,再行至下游不远处则是黄州城。

鄂县“南屏山”,不见载于古代文献,当是罗贯中虚构的诸葛亮祭东风之处。小说写曹操站在大船之上,“指南屏山如画”,则说明曹操之船与南屏山相距不远,既然是诸葛亮祭风之地,当位于长江南岸,可以目视手指;而曹操环视四顾可东望柴桑、西望夏口、南望樊山、北觑乌林,说明曹操所在位置应在三江口至黄州赤壁之间,其大江对岸有南屏山、樊口、西山等。

第二，主战场“赤壁”位于长江北岸。

《三国演义》描写黄盖以诈降计实施火攻突袭，率部“望赤壁进发”，其船队被文聘呼为“南船”，足见黄盖自南岸而来向北岸进击，则曹操驻扎的江北岸正是“赤壁”；甘宁、吕蒙等部突袭之重地“乌林”，是曹操步军驻营之地，无疑也在长江北岸，距离“赤壁”应该不远，否则水步军难以协调作战。太史慈“直奔黄州地界”、凌统“直截夷陵界首”，均为今鄂东江北地名。此处“夷陵”当是“西陵”之误，两汉时期在鄂东地区设置了西陵县，辖今武汉市江北地区中东部和黄州市西北部，与邾县紧邻。可见，罗贯中肯定赤壁之战主战场在长江北岸的黄州赤壁、乌林一带。

《三国演义》所写赤壁之战的战地方位，与魏晋原始史籍记载高度吻合。《三国志·周瑜传》载“瑜曰：‘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933-934]“裴注”引《江表传》对周瑜黄盖诈降、火烧赤壁的过程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至战日，盖先取轻利舰十舫，载燥荻枯柴积其中，灌以鱼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龙幡于舰上。时东南风急，因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盖举火白诸校，使众兵齐声大叫曰‘降焉！’操军人皆出营立观。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往船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寨。瑜等率轻锐寻继其后，擂鼓大进，北军大坏，曹公退走。”^[934]初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八十《火部》载“《英雄记》曰‘周瑜镇江夏，曹操欲从赤壁渡江南，无船，乘排从汉水下，住浦口。未即渡，瑜夜密使轻船走舸百艘，艘有五十人移棹，人持炬火，火燃则回船走去，去复还烧者。须臾，烧数千排，火大起，光上照天，操夜去。’”^[632]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一《筏部》和卷八百六十八《火部》亦有类似的记载。《英雄记》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所作，王粲曾是赤壁之战的亲历者，《英雄记》记述汉末人物和事件，“裴注”多次引用其史料。另外，《三国志》之《甘宁传》中有“随周瑜拒破曹公于乌林”之记录^[956]，《吕蒙传》中有“与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于乌林”之记录^[941]，《凌统传》中亦有“与周瑜等拒破曹公于乌林”之记录^[958]，等等。

《三国志》等史籍记载了赤壁之战的大致情况和方位：其一，周瑜原计划进军至夏口（今武汉市）布防，在进军途中不料曹军已经越过夏口，双方在大江之上遭遇，随即展开水战，曹操水军初战失利，退至江北岸驻扎，即“引次江北”；孙刘联军退回江南岸驻营，即“瑜等在南岸”。孙刘联军从鄂县西山、樊口一带出发，又尚未抵达目的地夏口，则双方遭遇之地应在夏口至鄂县西山、樊口之间。《三国演义》描写双方在鄂县西山上游约五十里处的三江口打了一场遭遇战，完全合乎历史真实。其二，曹操驻营的江北岸即是“赤壁”，计划从赤壁渡江南攻击孙刘联军。所谓“赤壁”，即赤色的崖壁，它是个泛概念，可以指某一块红色的崖壁，也可以指一片江滨崖壁。古荆州境内长江及其支流的江岸经浪涛长期冲刷，颜色多呈暗红色，宛如烈火烧过一样，十分显眼，人们习称“赤壁”。湖北江汉间有多处“赤壁”，其原因就在此。今黄州市堵城镇西河铺与三江口紧邻，从西河铺至黄州赤壁矶约三十余里的江岸均呈现暗红色，均属于“赤壁”的范畴。其三，黄盖实施诈降计，其装满燃料的船队在距离北岸曹军二余里时突然发起火攻，“烧尽北船”，周瑜率主力迅速跟进，展开凌厉进攻，终致“北军大坏”，则大战之地正是江北岸“赤壁”，“北船”、“北军”都含有方位指示。而所谓“北军大坏”，首先是驻扎赤壁的曹操水军遭到黄盖火攻而全线崩溃，接着是驻扎乌林的曹操步军又遭到甘宁、吕蒙、凌统等部突袭而陷入混乱。“乌林”之地应与“赤壁”相邻，今黄州市团风县古称“乌林”，与三江口相距十余里，与黄州赤壁相距四五十里，符合古代排兵布阵之常理。

毫无疑问，《三国演义》描写“赤壁”、“乌林”等赤壁大战之地均在长江之北岸，与《三国志》、《江表传》等魏晋原始史籍的记载高度吻合，是历史的真实再现，不应简单地视为文学虚构。

三、“蒲圻赤壁说”既不符合原始史籍记载也有悖军事常理

今之学术界有所谓“武赤壁”与“文赤壁”之论，认为蒲圻赤壁乃是历史上赤壁之战发生之地，即为“武赤壁”；而黄州赤壁乃是苏东坡等文人辞赋歌咏的赤壁，即为“文赤壁”。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卷二《长沙郡》云：“（蒲圻）县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周瑜、黄盖此乘大舰上破魏武兵于乌林。乌林、赤壁其东西一百六十里。”^[67]初唐李泰《括地志》卷四“鄂州”条云“鄂州蒲圻县有赤壁山，即曹公败处。”^[232]中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第二十七在鄂州之“蒲圻县”条下云“赤壁山，在县西一百二十里。北临大江，其北岸即乌林，与赤壁相对，即周瑜用黄盖策，焚曹公舟船败走处。”^[646]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之一百一十二在

“蒲圻县”条下亦云“赤壁,在县西北一百五十里,江岸北,即曹操为周瑜所败之处。”^{[13] 2285}此后,《舆地广记》《舆地纪胜》《方輿胜览》《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等等史地名著皆沿袭“蒲圻赤壁说”。

盛弘之可谓是“蒲圻武赤壁说”的首创者,隋唐以后诸多历史地理典籍都未做深入考证工作,不过是沿袭旧说而已,即盛弘之《荆州记》乃是“蒲圻武赤壁说”的源流。那么,盛弘之的说法是否有历史依据呢?

盛弘之,亦作“盛宏之”,南朝刘宋时人。宋元嘉八年(431年),临川王刘义庆出任荆州刺史,盛弘之随之供职荆州,其《荆州记》当作于元嘉八年(431年)之后。中国古代许多地理书籍与志怪类作品存在着密切关联,盛弘之《荆州记》颇多志怪内容,并非严谨的历史典籍,正如唐人杜佑在《通典》卷第一百七十一《州郡序》中所评“罗含《湘中记》、盛弘之《荆州记》之类,皆自述乡国灵怪、人贤物盛,参以他书,则多纰缪。”^{[14] 4451}盛弘之作《荆州记》时距离建安十三年(208年)发生的赤壁之战已有两百二十余年,此前从无周瑜、黄盖在蒲圻县破曹之说,其根据何在?书中言“周瑜、黄盖此乘大舰上破魏武兵于乌林,乌林、赤壁其东西一百六十里”,这个距离与《三国志》关于作战双方隔江对峙的记述不符,显然是一种根据民间传闻所作的臆测之词,实无任何可信的历史依据。

近人梁启超说得好:鉴别历史文献的价值,“自当仍以年代为标准,年代愈早者,则其可信据之程度愈强。”^{[15] 99}所以,无论历代有多少历史地理典籍沿袭盛弘之“蒲圻武赤壁”之说,也无论这些历史地理典籍有多么权威,《三国志》等魏晋原始史籍的记录仍是最可靠、最可信的历史依据。除了前文所引若干原始史料之外,这里不妨再补充几条《三国志》等史籍的记载。《先主传》云“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至南郡。”^{[6] 654}《吴主传》云“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归,留曹仁、徐晃于江陵。”^{[7] 827}《周瑜传》亦云:“(曹)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备与瑜等复共追。”^{[8] 934}这类记载都证明赤壁之战发生在江夏郡境内,赤壁战败后曹军从江夏郡退至南郡,力求守住南郡,刘备、周瑜联军水陆并进一直追至南郡,无论是曹操退军,还是孙刘联军追击,都应走了相当的路程。而蒲圻赤壁处于江夏郡西南边缘,其江北即为南郡,江夏郡与南郡在此以长江为界,如果曹军在蒲圻赤壁之江北岸,周瑜等在江南蒲圻赤壁,则曹军根本就未进入江夏郡,周瑜水军则船行南郡之水道,那何有曹操“还保南郡”、“备、瑜等复追至南郡”之说?

我们不妨再看看裴松之的解释。裴松之与盛弘之是同时代人,自幼勤于学习,博览典籍,是一位识见渊博、治学严谨的史学家。从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所署时间来看,《三国志注》完成于宋文帝元嘉六年(429年),比盛弘之《荆州记》要早八年。“裴注”注释《贾诩传》时评论赤壁之战云“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9] 248}裴松之用“运数”解释赤壁之战的失败不足论,但他说“凯风自南”,明确地道出了江北即为“赤壁”、曹操败于江北赤壁的事实,周瑜、黄盖趁东南风起一举发起火攻,终致北岸赤壁“成焚如之势”,孙刘联军驻扎于南岸,“火烧赤壁”岂能烧南岸?今之学者们不相信史学家裴松之的判断,却去深信幕僚盛弘之不着边际的说法,实在有点令人匪夷所思。

“蒲圻武赤壁说”不仅不符合原始史籍的记载,也有悖于古代军事常识。周瑜最初的战略决策是“进驻夏口”与曹军对峙。曹军自江陵东征,既可以顺江而下至夏口,也可以从夏水入汉水至夏口。江南夏口城一带是监视和防堵长江和汉水两个方向来敌的军事要塞,也是赤壁之战前东吴军队与黄祖军队多次争夺的阵地,周瑜计划驻守夏口一带,目的就是有效监视和阻挡曹军东进。曹操征伐荆州有多少兵力呢?《江表传》记载曹操写信给孙权扬言“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10] 827},显然是夸大其词。《周瑜传》载周瑜认为“不过十五六万”,加上刘表降卒“七八万”,计二十三万,这又是保守的说法。^{[11] 933}《三国志·诸葛亮传》载诸葛亮著“论”曰“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12] 1057-1058}诸葛亮是陆逊死后吴国执掌军权的大将军,“论”是一种公文文体,所言是不可以随意虚夸的,诸葛亮说赤壁之战时曹军“三十万”应该是可信的。曹军三十万,加上荆州降兵近四十万,投入前线的兵力不会少于二十万;孙刘联军约五万,投入前线的兵力应在四万上下。明显处于弱势的联军即便按原计划进驻了夏口,也不会贸然深入四百里之外的蒲圻赤壁,因为如此部署犯兵家之大忌:一来从鄂县(联军后方基地)至蒲圻赤壁约有六百多里水程,很难保证后勤供应;二来深入夏口上游四百里外的蒲圻赤壁一带与曹操大军对峙,如果曹操派遣一支劲旅从汉水进入夏口截住联军后路(截敌后路是曹操惯用手段),对联军实行两面夹击,则联军的悲剧命运可想而知。周瑜、孙权、鲁肃、刘备、诸葛亮等人都是深谙军事谋略的兵家,断不会犯如此低级错误。古今学者多言孙刘联军深入夏口上游四五百里的蒲圻赤壁与曹军对峙,不过是不懂军事常识的书生纸上谈兵。

无数学者依据《三国志·武帝纪》中“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熹救合肥”的记载，便认定曹操既然到了巴丘（指今湖南岳阳）再顺流而下至蒲圻赤壁乃是自然之理。殊不知此“巴丘”未必指巴丘城（即巴陵城，今岳阳市），因为巴丘城的建造时间是在赤壁之战后，赤壁之战前只有巴丘山而无巴丘城。曹操所至“巴丘”，应指“巴丘湖”，即江北“云梦泽”。唐人徐坚《初学记》卷七引南朝宋刘澄之《荆州记》云“官亭，即彭蠡泽也，谓之彭泽湖，一名涇泽；青草湖一名洞庭湖；云梦泽一名巴丘湖。凡此并昭昭尤著又广大也。”^[14]¹⁰⁴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六亦云“宋《永初山川古今记》：‘云梦泽，一名巴丘湖，荆州之藪。故魏武帝与吴主书：赤壁之困，过云梦泽中有大雾，遂使失道。’是此。”^[13]²⁸⁴⁷关于这一问题已多有学者著文论及（参见杨采华《〈三国志〉中的巴丘方位及地名探讨》，《地名知识》1989年第3期；刘盛佳《东吴军事要地鄂州、黄州、武汉、陆口、岳阳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专辑《赤壁战地辨证》；朱靖华《黄冈赤壁为赤壁之战古战址铁证如山》，《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专辑《赤壁战地辨证》；王琳祥《云梦泽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专辑《赤壁战地辨证》等），兹不赘述。

而曹操“遣张熹救合肥”这条史料也从侧面证明了“巴丘”不可能是江南巴丘城的事实。张熹率部救合肥之围的时间，《魏书·武帝纪》和《吴书·吴主传》记载有出入，《武帝纪》说是在兵败赤壁前，《吴主传》说在兵败赤壁后，裴松之经过分辨后早已做过定论“二者不同，吴志为是。”^[2]

曹操赤壁失利后，孙权等趁机围攻合肥，曹操遣将军张熹率轻骑驰援合肥。《三国志·蒋济传》亦记录过此事“建安十三年，孙权率众围合肥。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唯遣将军张熹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338]张熹所部行军线路是从荆州江夏郡向北穿越大别山至豫州汝南郡汝水流域，再折向东南合肥。如果曹操所至“巴丘”指江南巴丘（今岳阳市），则张熹所部如何北渡长江避开孙刘联军的追堵而千里穿越大别山？一千骑兵要经过数百里河流纵横、湖泊密布的水网地区，岂有不被孙刘联军歼灭之理？这显然是一个有悖军事常识的行动。如果将“巴丘”理解为“云梦泽”，则一切显得顺理成章。云梦泽位于长江之北，覆盖面较广，曹操兵败鄂东赤壁，向西撤退至云梦泽，遣张熹驰援合肥，张熹即可沿云梦泽北缘（今湖北汉川、天门一带）北进直接翻越大别山，不但行军线路便捷，而且完全可以避开孙刘联军追堵的巨大风险。从军事角度看，张熹救合肥的出发地“巴丘”不可能在长江南岸。也就是说，曹操兵败赤壁、张熹救合肥等历史事件均发生于长江之北，与江南蒲圻赤壁、江南巴陵城毫不相干。

总之，元末明初文人罗贯中虽然是位充满艺术想象力的小说家，但他熟读史籍，精通军事战略，认真研究过发生于汉末三国时期的诸多重要战役，其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对于赤壁之战战地大致方位的界定，完全是基于魏晋原始史籍的记录，具有毋庸置疑的历史真实性。

参考文献：

- [1] 罗贯中. 三国志通俗演义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2] 陈 寿. 三国志 [M]. 裴松之，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3] 房玄龄. 晋书 [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4] 酈道元. 水经注 [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5] 杨守敬. 水经注疏 [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 [6] 夏征农. 辞海 [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 [7] 祝 穆. 方輿胜览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8] 范成大. 吴船录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9] 欧阳询. 艺文类聚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0] 盛宏之. 荆州记 [M]. 谭麟，点注.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 [11] 李 泰. 括地志 [M]. 贺次君，辑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2] 李吉甫. 元和郡县志 [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3] 乐 史. 太平寰宇记 [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14] 杜 佑. 通典 [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 [15]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 [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 [16] 徐 坚. 初学记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陈道斌）